

张君劢 中国文化观研究

欧阳询 著



人民出版社

张君劢

中国文化观研究

欧阳询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曹 歌
封面设计：石笑梦
责任校对：方雅丽
版式设计：庞雅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君劢中国文化观研究 / 欧阳询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311-9

I. ①张… II. ①欧… III. ①张君劢（1887—1969）—思想评论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6061 号

张君劢中国文化观研究

ZHANGJUNMAI ZHONGGUO WENHUAGUAN YANJIU

欧阳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48 千字

ISBN 978-7-01-020311-9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论 走进张君劢的中国文化观.....	1
第一章 20 世纪 20 年代：张君劢的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观的初步成型.....	29
第一节 20 世纪 20 年代张君劢的启蒙思想.....	29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张君劢中国文化观的初步成型.....	50
第三节 张君劢中国文化观初步成型的精神层面：“知识解放”.....	68
第四节 张君劢中国文化观初步成型的政治层面：“政权解放”.....	78
第五节 张君劢中国文化观初步成型的经济层面：“生计解放”.....	89
第二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张君劢的民主建国思想与 中国文化观的全面展开.....	104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中国文化观的转向.....	104
第二节 张君劢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哲学.....	110
第三节 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131
第四节 张君劢的新政治制度设计.....	151

第三章 20 世纪 50—60 年代：张君勱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与
中国文化观的成熟完善..... 169

第一节 1948 年与 1949 年之交：张君勱中国文化观的再转向..... 169

第二节 张君勱复兴儒家思想之努力..... 180

第三节 张君勱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211

结语 张君勱中国文化观的贡献与偏失 229

参考文献..... 238

导论 走进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

正如哲学家冯契所指出，中国近现代哲学主要是回答一个时代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①为此，中国近现代哲学家们苦心孤诣、戛戛独造，创立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毋庸讳言，这些思想学说包括了许多不是哲学自身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思考与探讨。从文化哲学角度看，文化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一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含了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方面，因此，一个哲学家对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可称之为他的中国文化观。所谓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正是此意。这样看来，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不仅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法律、现代新儒学等思想，而且贯穿于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必明乎此，然后能知当代张君勱思想研究存在的不足，比如：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现代新儒学进行分块研究，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又对其中国文化观作一种狭义的理解，仅仅研究张君勱于20世纪30年代所明确提出的“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②这一中国未来文化总纲领。所以，只有从哲学的视域出发，紧扣“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主题，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

① 冯契：《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载《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② 张君勱：《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一、作为哲学家的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年),中国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政治家,法学家。当然,这些多重身份及其相关活动,并非截然分开、渺不相涉的,而是互相关联、有机统一的。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①。于是乎,无论作为哲学家和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还是作为政治家和法学家,张君劢皆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进一步说,正因为张君劢并非单就政治论政治、单就法律论法律,而是“拿了这种材料后,加以一种哲学的思考”^②,所以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才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浓重的哲学味道;同样,也正由于张君劢并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哲学家,而是以“中国向何处去”为其思想主题,所以他的哲学思想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感,并具有广博的题材和宏富的内容。

张君劢首先是以政治家身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早在1906年,为了反对革命派的革命主张、为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他编译了约翰·穆勒的《代议政治论》,以《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为题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期第18号。这是他生平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就某个意义上说来,《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决定性地确定了他此后政治活动所采行为方向”^③。但众所周知,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政治一直处于风云变幻、波起云涌之中,张君劢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论也由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更新。清朝末年,他站在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不仅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论今后民党之进行》等文章,而且亲身投入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如1907年与梁启超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政闻社”、1911年年底返回家乡浙江宝山任县议会议长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张

① 程文熙:《张君劢先生的政治十大译著》,载郑大华:《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 张君劢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4页。

②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3卷第8期,1935年。

③ 江勇振:《张君劢》,载《张君劢传记资料》(五),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君勱一改反对革命派的立场，而成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忠实拥护者，不仅撰写了《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内的政治与外的政治》、《政法上的唯心主义》、《国内战争六讲》等著述，还积极地践履其政治理论。比如，1912年4月，为了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以防范和钳制袁世凯，他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民主党；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放弃柏林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专程回国襄助蔡锷等友人发动护国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勱认为，旧有的议会民主政治滋生了议而不决、政出多门等诸多弊端，故须向苏联和德、意的集权制方向修正，以图建立英美式的“集中心力的国家民主政治”^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②。为此，他撰写了《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立国之道》等著述，并参与组建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展各种民主建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推动和平民主建国的进程，张君勱参加了政协会议，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故在1946年初他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赠送一块“民主之寿”的匾额，以表敬意。

张君勱认为，“中国要变成近代国家，当然条件很多，如巩固国防，如发达科学，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还有一最切要、最基本的条件，便是法律”^③。是故，他除了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还热衷于宪法的研究和制定，以致享有“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综观其一生，张君勱共拟定了两份宪法草案：第一份是1922年为上海七个职业团体发起的国是会议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草案包含十一章内容，其中两章是关于国民的权利义务，另外九章是关于内阁制的设计；第二份是1946年初为政协会议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基本原则是“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这使“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④。为了对

① 张君勱：《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上），《再生》第1卷第2期，1932年。

②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③ 张君勱：《法治与独裁》，《再生》第2卷第10期，1934年。

④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这两份宪法草案进行说明，张君勱分别于1922年和1946年出版了两本法学专著：《国宪议》和《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除此之外，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宪法或宪政研究的文章，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德国新共和宪法评》、《国宪草案之要点》、《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人权为宪政基本》、《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等。可见，宪政是张君勱的毕生追求，正如他后来所说：“我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制宪事业。……良以一生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①张君勱曾这样分析道：“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②对此，不论是时人或后人，都会觉得他的这种宪政民主思想过于理想化。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张君勱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是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早在少年时代，张君勱就熟读过《近思录》、《日知录》、《曾文正公全集》、《资治通鉴》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于是，迄至青年时代，儒家思想便成了他日后理解和接受倭伊铿、柏格森、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例如，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道：“柏氏倭氏言与理学呈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扩弃之。”^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观论战时期，以及20世纪30—40年代，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张君勱思想的内核，或者说他还尚未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准确地说，他真正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以1958年元旦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标志。实际上，在人生观论战时，张君勱虽明确提出了“新宋学”的口号，却未作进一步的深入阐发；并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只撰写过一篇有关儒学的文章，即《孔子所谓智：达德之一》。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张君勱为了弘扬民

① 张君勱：《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47页。

③ 张君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晨报·副刊》1923年5月6日。

族精神、培养民族道德、提高民族自信心，一共撰写了6篇有关儒学的文章，如《吾国思想家之善恶论》、《自孟荀至阎戴之性论》、《理学对于中华民族之功罪》、《汉学宋学对于吾国文化史上之贡献》等。很显然，这些篇文章无一直接关乎社会政治问题，而社会政治问题正是张君勱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何以见得？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代表作《立国之道》的“凡例”中说道：“所望海内读者勿视为一党一人之私言，而视为全国讨论政治出路的公共草案。”^①然而，在1948年与1949年之交，张君勱因远离政治舞台以及受世界文化危机的刺激，明显转到了现代新儒家的方向，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从著述上看，他晚年出版的大部分著作是关于儒家思想的阐发之作，如《义理学十讲纲要》、《比较中日阳明学》、《新儒家哲学思想史》、《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等；同时，他还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如《现代世界的纷乱和儒家哲学的价值》、《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宋代儒学复兴之先例》、《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总的说来，这些著述的旨趣在于阐明“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②，并使中国现代化建立在更稳固、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诚然，创造性地诠释儒家思想，是张君勱被称为中国现代哲学家的理据之一。因为，在《宋代儒学复兴之先例》一文中，他明确地把儒学解释为哲学：“吾此所谓儒学，以哲学思想为范围，与宗教无关，与政治社会无关，与经学今文派古文派无关，与理学家程朱陆王派别无关。”^③此外，张君勱为中国学习和吸收西方近现代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0年，他曾经回忆说：“自我始有志于西方哲学，迄今已四十年矣。”^④这40年间，他所译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就有倭伊铿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黑格尔

①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② 张君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79页。

③ 张君勱：《宋代儒学复兴之先例》，（中国台湾）《人生》1964年第356期。

④ 张君勱：《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18页。

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它们犹如钱塘江潮，前冲后涌、波澜壮阔、叹为观止，但他“在数十年中，除对西方哲学界之宗匠康德氏素所钦服外，其余各大家常觉其独到而不免于一偏”^①。究其实质，康德哲学之所以为张君勱所钦服，主要是因为它主张经验主义认识论与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调和、知识与道德的并重。张君勱指出，这种调和精神亦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诚如其言：“我们知道，康德的方法和儒家一样，因为康德认为道德与科学知识同等重要。”^②如此一来，他自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唯有采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长，儒家哲学方能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合于现代生活；亦唯有以儒家哲学为本位，新奇独特而又不免于一偏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方能发荣滋长。进而言之，晚年张君勱把古希腊哲学视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先导，所以他在会通儒家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同时，还努力阐明儒家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共通之处。例如，在《孟子与柏拉图》、《孟子哲学》、《中国哲学中之理性与直觉》等文章中，张君勱就着重分析了孟子哲学与柏拉图哲学、朱熹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相同点。于是，通过“三四十年之心思积聚”来会通儒家哲学、古希腊哲学、康德哲学以及其他西方近现代哲学，晚年张君勱建立了一种名为“唯实的唯心主义”^③的哲学体系。所谓“唯实的唯心主义”，是指“以唯心论为本，兼采唯实论之长”^④。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了知识论、道德论和形上学三个部分。

接下来，再简要考察一下张君勱作为政治家、法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活动，对其哲学思想所投下的影响。

① 张君勱：《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21页。

② 张君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96页。

③ 张君勱：《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④ 张君勱：《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据张君劢 1955 年回忆，他“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①是在 1919 年欧游之时。那么，他为何要“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实方面的两个刺激”：一个是民国成立以来的国内腐败政治，另一个是巴黎和会上的国际强权政治。这两个刺激，使他从那时起“决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或者是道德力，或者是智识力，或者是经济力，专在这方面尽我的心力”^②。由上文可知，“道德力”和“智识力”，属于张君劢所谓的哲学内容，而“经济力”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这表明他并未完全抛弃社会科学，只是令它做哲学的材料。进一步说，张君劢拿社会科学做材料，加以一种哲学思考，究竟会有怎样的效果？他说：“从哲学以下观察，能在各种社会思潮背后，寻得其总根据，所以我说从哲学以观察社会或自然界，比较的看得清楚。……治哲学的人，比治社会科学的人对于宇宙现象之第一原则，接近一层。”^③举例以明之，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政治上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经济上的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宗教上的自然宗教观，同以理性为出发点。在这里，透过张君劢所谓的抽象理性，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在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下，观察社会上的政治、经济与宗教思潮。固然，根据张君劢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观又是世界观，“讲形上学时，是对于一切现象，加以一个本体论的见解以及宇宙论的见解。这种办法同样可以应用到社会上去”^④。反过来看，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历史观或世界观的视域，张君劢从“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后，对于政治、经济、观念文化等问题的看法才会显得更加深刻、全面，同时也更加主观化、理想化。比如，在《立国之道》中，他如是说道：“他们（指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以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民众的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到了无阶级敌对的时候，国家即可消灭。……这是他们只看见其表面的变动性，而未认识其

①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 3 卷第 8 期，1935 年。

②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 3 卷第 8 期，1935 年。

③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 3 卷第 8 期，1935 年。

④ 张君劢：《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6 页。

自体的永恒性。”^①由此可见，张君勱与马克思主义者两种对立的国家观，恰是根源于双方正相反的社会历史观或世界观。

1919年欧游时，张君勱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深感“国家自己无强大兵力，外交是空话，乃至国际公法，更是空话”^②。于是，他决心将其所藏国际法书籍付诸一炬，不再读这些无用的书。1922年5月，他为上海国是会议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1922年回国，我个人兴趣又不在宪法方面，而转入哲学问题。”^③在用两周时间拟完这份宪法草案之后，他明确表示道：“我对于宪法的兴趣，从此便告一结束。”^④他对于宪法的兴趣为什么改变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于‘宪法之前提’问题。”^⑤所谓“宪法之前提”，包括政府和人民两个方面，但更关键的还是人民的能力。张君勱指出，法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人心”或“民意”为最后的根本。例如，古代法律操于帝王或贵族之手，与农民无涉，所以引起种种起义。及至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法律则操于商人或资本家之手，与工人无涉，所以又引起罢工、革命。“现在的欧洲呢，社会主义又很盛行了。……故多数工人，不满意于工主之待遇，亦将其自由意志，随时表现。而推此种潮流，必影响于法律上，是无疑的。”^⑥由此，张君勱得出了以下结论：“人心”或“民意”天天是变的，故法也天天是变的，“法律之是非”和“社会之进步”，“即以自由意志之人之多少为标准”^⑦。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关注宪法本身转为关注“宪法之前提”，不仅是张君勱产生哲学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也决定了他的法律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社会历史观、自由意志人生观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换言之，张君勱的社会历史观或世界观、人生观，并不是纯粹的哲学玄

①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② 张君勱：《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3卷第8期，1935年。

③ 张君勱：《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 张君勱：《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 张君勱：《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⑥ 张君勱：《政法上的唯心主义》，《法学季刊》第1卷第5期，1923年。

⑦ 张君勱：《政法上的唯心主义》，《法学季刊》第1卷第5期，1923年。

思，而是以解决中国的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现实问题为鹄的。

如果说张君劢作为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思想活动，是从现实维度给予其哲学思想以影响的话；那么，他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活动，无疑是从理论维度给予其哲学思想以影响。简言之，儒家思想对于张君劢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少年张君劢在学习“三通”时，对于其师所说的“吾国文物典章制度寓于其中矣”^①不甚理解，但后来他逐渐明白：“所以化民成俗者，有礼乐教育选举。所以驾御人民者，有兵刑制法。所以取于民者有赋税征役。所以养民者有农田水利工商交通。此教民养民御民之制度，起于人群之需要，即荀子所谓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者是矣。”^②实质上，张君劢只看到了“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③，却未明白阶级社会中的文物典章制度具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性质，故终生信奉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国家观。其次，在知识论和道德论方面。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④对于其中的“义理”一词，张君劢解释道：“孟子所谓义理，其属于彼也、此也、黑也、白也，是为知识之所由成立。其属于善也、恶也、是也、非也，是为道德之所由成立。”^⑤嗣后，他正是从知识论（认识论）和道德论两个方面，对其哲学体系“唯实的唯心主义”中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我之系统中，以万物之有为前提，而其论心之所以认识与文物之所以建立，则以心之综合与精神之运行为归宿。”^⑥最后，在哲学方法论方面。张君劢认为，与西方

① 张君劢：《立斋读书记——〈三通〉性质今解》，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下），（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459页。

② 张君劢：《立斋读书记——〈三通〉性质今解》，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下），（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467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④ 《孟子·告子上》。

⑤ 张君劢：《中国哲学中之理性与直觉》，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18页。

⑥ 张君劢：《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哲学家好言彻底和界限分明不同，中国儒家好言包容和折两用中，如孔子对于学与思之兼顾、孟子对于形上与形下之贯通等。在折衷方法论的影响下，张君勱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一直致力于孟子哲学与荀子哲学、王阳明哲学与朱熹哲学的调和，指出孟子和王阳明所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与荀子和朱熹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并行不悖的，如其所言：“在外之物理，以朱子之说应之，在内之德性，以阳明之说应之。此亦两说之可以并存者矣。”^①

综观上文可知，张君勱作为政治家、法学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活动，对他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作为政治家、法学家的思想活动，促使他在 1919 年欧游时“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进而从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现实政治、法律、经济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活动，为他开展哲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包括社会历史观、知识论、道德论、方法论等。于是，在现实与理论的交互作用中，张君勱经过“三四十年之心思积聚”^②，在晚年建立了“唯实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二、作为哲学问题的张君勱中国文化观

欲要说明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是一个哲学问题，必须采取以下三个步骤：首先，说明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其次，分析什么是哲学问题，哲学问题有何性质；最后，阐明张君勱中国文化观的哲学性质和哲学内涵。下文将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展开论述。

在说明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之前，实有必要了解他所说的文化概念。平心而论，他所说的文化概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他有时使用狭义文化概念，有时又使用广义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他说：“语言文字思想，是文化问题；有无深识远见之政治家，是政治问

① 张君勱：《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中国台湾）学生书局 1981 年版，第 537 页。

② 张君勱：《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中国台湾）《人生》1960 年第 232 期。

题。”^①“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②广义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概念，他说：“所谓文化，即是一社会中精神与物质生活之全部现象。”^③“所谓文化，概括言之，就是一切力量总合的发现，因为它包含着思想、学问、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及其他一切。”^④正是在广义文化的意义上，张君勱又将文化等同于文明、现代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西方文明，诚如他在《现代世界纷乱与儒家哲学的价值》一文中所说：“但是西洋文明，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我们发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试举一个例，所谓西洋文化，知识即力量，毕竟就是权力的思想，它的知识，最明白地表现于自然科学上面的，即是现代技术的完成。”^⑤要之，在张君勱那里，文化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广义的“大文化”概念。

既然在张君勱那里，文化主要是指“一社会中精神与物质生活之全部现象”，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思想、学术等，那么，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就是指，张君勱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发展的构想，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观、中国现实文化观和中国未来文化观；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张君勱的中国文化观则涵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内容。在《立国之道》的“自序”中，张君勱说道：“鄙意凡为民国之人，其责任一方为保存民国缔造之传统，他方为不断注意世界潮流，于斟酌去取之中，指示我们的出路。我之所以写此书，其目的即在使前人之传统，得随着时代共同进步。况自抗战前后，吾国介于世界两种潮流对峙之中，在经济上言之，一方为资本

①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②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③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④ 张君勱：《现代世界纷乱与儒家哲学的价值》，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下），（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814页。

⑤ 张君勱：《现代世界纷乱与儒家哲学的价值》，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下），（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814页。

主义，他方为共产主义；就政治上言之，一方为十九世纪式之民主政治，他方为俄、意、德之反民主政治。吾中华民国苟不愿为世界两大壁垒所拉扯，惟有超然两者之上，自求解决之法。”^①在这段话中，“保存民国缔造之传统”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观，“注意世界潮流”和“斟酌去取”代表的是中国现实文化观，“指示我们的出路”代表的则是中国未来文化观，三者是一个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同时，“世界两种潮流”分别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种潮流，而“超然两者之上，自求解决之法”则反映了张君勱的旨趣在于建立既符合世界潮流又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新文化。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张君勱就认为，建立既符合世界潮流又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新文化，即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比如，在《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一文中，他说道：“其（指中国新文化运动——引者注）心摩而力追者，在欧洲之文艺复兴。以为西方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两大时间之先，尝经文艺复兴，以及思想解放之工夫。故吾国改造之路，亦不能脱此一级。究竟西方改造之三时期，容许吾人一一挨次而来耶？抑时异地异已，不容吾人拾级而登耶？”^②可见，在张君勱看来，“吾国改造之路”或者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包括了“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思想解放”，并且这三大改革（解放）必须同时并举，而不能像西方那样“一一挨次而来”。又如，他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一文中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墨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篇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③在这里，“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经济上的工商政策、思想上的科学主义；故此，“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必须将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与精神生活结合起来，以便超越欧洲现代文化模式。再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君勱针对全盘西化派与本位文化派之间的激烈论争，特意撰写了《今后文化建设问题——

①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② 张君勱：《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改造》第4卷第3号，1921年。

③ 张君勱：《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